

深一度
浙江新闻名专栏

家电“甬军”新突围

为期一年的家用洗衣机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告一段落,但从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提升品牌影响力角度来看,宁波家用洗衣机质变之路仍很长。在上周召开的总结大会上,市质监局和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专家认为,未来要通过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,全面提升宁波家用洗衣机产业的竞争力——

宁波开启家用洗衣机质变新征程

本报记者 张正伟 通讯员 潘志明

量的“神话”不为浮名遮望眼

今年的专项行动,是宁波家用洗衣机产业的一次“起底之旅”。作为全国洗衣机四大生产基地之一,目前我市共有79家洗衣机生产企业,数量占全国的50%左右,位居四大生产基地之首。2013年全市家用洗衣机产量有1300多万台,占全国产量的近20%。

在产品种类上,全国家用洗衣机双桶洗衣机占了总产量的三分之二,全自动洗衣机的产量占比不多。在品牌建设上,目前我市家用洗衣机品牌“两多三少”。“两多”是指自主品牌多但贴牌更多。79家整机生产企业家有自主品牌,但95%的企业从事贴牌生产,其中超过85%的以贴牌生产为主。“三少”是指自主品牌产量少,维护投入少、影响力少。一份调查报告显示,今年前五个月,全国家用洗衣机自主品牌与贴牌产品产量比为1:2.5;企业用在品牌维护上的投入约为286万元,平均每家3.71万元;在全市家用洗衣机自主品牌中,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3个,在有效期内的浙江省著名商标1个,在百度、360等网站搜索结果中,宁波无一品牌入选国内洗衣机十大品牌。



质量提升为宁波洗衣机企业找到突围之路。(张正伟 徐莹 摄)

经过30多年的发展,宁波家用洗衣机以低端制造和贴牌经营为主的模式,虽然造就了量的“神话”,但多为他人作嫁衣,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。“这次洗衣机质量提升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,但是从质优宁波建设,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角度看,我市家用洗衣机产质量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,不是靠几次行动、几次整治、几次宣传可以解决的。”市质监局局长郑德兵告诉笔者,全市洗衣机生产企业要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,把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的立足点切实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。

改建结合 企业勇当质量“主体”

企业是产品质量的第一责任人,

提升我市家用洗衣机的整体质量,关键还是要靠企业。此次专项行动发现,许多洗衣机生产企业因为规模较小、不适应整改后的成本增加,从而放弃了产品质量的提升,或者干脆停产转产。

市质监局通过与地方政府、行业协会合作,整改、建设“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”,着力解决企业品牌创建过程中意识不强的问题。专项行动开展前,市质监局与慈溪市、鄞州区政府进行充分沟通,达成共识;在全市家用洗衣机产品质量提升工作动员会上,77家家用洗衣机生产企业签署了《产品质量提升承诺书》;市家电行业协会、慈溪市冰洗联合会行业协会与行动领导小组建立信息定期通报机制。市质监局积极争取政策支持,大力

实施品牌战略,对争创名牌产品的企业给予人力、智力和财力支持。提供完整的咨询服务,组织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和各级质监部门的法制人员,为企业维护自主品牌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服务。在多种措施带动下,宁波家用洗衣机生产企业提升质量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。赛亿电器组织技术人员梳理产品的生产过程,提高配件供应的质量要求,加强配件进口检验和产品出厂检验力度,确保产品质量符合标准要求;朋友电器邀请专家团队驻厂,进行现场“会诊”和就地指导,确保质量问题整改到位。

一年下来,宁波家用洗衣机生产企业的品牌建设意识也明显提高。宁波吉德实施品牌发展战略,加大品牌建设投入,在2013年—2014年度中国家用电器行业品牌评价结果发布会上,“吉德”牌洗衣机成功跻身十大优秀品牌之列。一些家电企业还积极研发滚筒洗衣机,申请产品3C证书,今年新获证书13张,同比增长8%。

在质量意识提升的基础上,我市家用洗衣机生产企业的研发投入不断加大。韩电集团累计投入经费数亿元,建立了国内领先的计算机自控洗衣机生产线,还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、上海交大、重庆大学等高校合作,积极将前沿家电理论转化为应用技术。

技术支持 一流服务作后盾

质量提升的背后是强大的技术力量作支撑。在宁波,一些洗衣机生产企业

受困于技术水平而打了“退堂鼓”。在宁波家用洗衣机产业质量引领的新征程中,市质监局将通过一流的技术服务,为广大企业保驾护航。

近三年来,市新创办了10余家洗衣机企业,这些企业存在着技术力量相对较差,对洗衣机标准不熟悉等短板,为此,市质监局电子技术中心开展“一对一”技术帮扶。开展核心实验室建设服务,为慈溪市顺达实业有限公司的洗衣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布局设计、测试设备选择、检测人员培训,使其顺利通过中国能效标识能效率检测实验室备案工作。针对部分洗衣机企业产品在抽查中不合格的情况,今年以来,市质监局电子技术中心派出50多名专家到10多家企业现场讲解,提出整改建议。

去年10月1日,GB12021.4-2013洗衣机能效等级标准正式实施,新版标准对能效等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我市不少洗衣机企业一时难以适应。市质检

院电子技术中心依托服务业示范科研项目《优化程序设计提高洗衣机能效等级的应用》,通过多次试验、数据分析、成功找到通过优化程序设计适当提高洗衣机的能效等级的方法,帮助宁波威驰、宁波达能等10多家洗衣机生产企业实现了能效等级提升。

我市是检验检测大国,目前拥有各类检验检测机构300多家,市质监局将以创建国家级“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示范区”为契机,将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向家用洗衣机行业延伸;根据我市洗衣机生产企业的分布特点,加大慈溪家电公共检验检测技术服务平台的建设力度,总结开放实验室经验,加大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四级质检技术机构合作力度,提高便利化服务能力和水平。

此外,我市还完善各类服务平台,通过教育培训平台,通过集中授课、边走边讲等形式,及时将新标准、新技术等知识送到企业手中,提升企业正确执行质量标准的能力。

延伸阅读

宁波洗衣机质量需“五注重”

在此次召开的洗衣机产品质量提升工作总结大会上,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测试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张振刚认为,宁波洗衣机质量提升,需做到“五注重”:
从加强品牌战略的高度开展质量工作,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打响品牌知名度。
不断加强合作,进行技术创新,实现整体发展。眼下,应及时调整产品结构,加强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和全自动滚筒洗衣机研发生产力度。

及时了解行业发展趋势,加大产品研发投入,通过加强检测技术水平,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把关水平。
关注新材料、机械制造、静音降噪、生物化学、智能化等五大技术的前沿信息,加大新技术应用水平。
在地方行业部门的帮助下,积极参与国家及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,引导洗衣机行业健康发展。(记者 张正伟)



别等出事了才想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

毛建国

近年来,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。忏悔形式一般有当庭发表自白、悔过书。其中14人在讲述时,以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开头,总结自己从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到当官后腐化的堕落过程,包括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、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标等(12月19日《新闻晨报》)。

读出事官的忏悔书,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有人说,这些忏悔再动人,也是骗人的假话,特别是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,更是透着浓浓的假。不排除有些出事官员的忏悔确实如此,但认为所有官员的忏悔是假话,特别是把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全部归结为骗同情,却未免偏激。

如果世上真有后悔药可吃,相信很多出事官员,会有另外的人生。客观地看,这些出事官员,尽管“头上缺少党纪国法这根高压线,忘记了为人为官的底线”,其为入处事也不是一无是处。很多出事官员曾经有理想有追求,有才华有努力,确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番成绩,不少甚至堪称“能人”。否认他们堕落的另一面是不负责任,否定他们努力的一面也有失公允。正如此,人们才感到可惜,感慨私欲像精神鸦片使人麻痹大意,私欲像脱缰野马使人奔向深渊。

俗话说,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一个人在自己生命或者事业、仕途走向终点时,特别容易追忆过去,反思一生得失。有些官员确实是农民的儿子,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了高位,可最终在权力的巅峰跌了下来。有这样的经历,感慨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,符合正常的情感逻辑。更何况,有些出事官员其人已废,其心未废、其情未废,还想做“最后一点贡献”,承担“最后一点责任”,这样带着感情反思自己的过去,以图给后来人以启示,当属情理之中,应不足为怪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强调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,与“腐败出身论”并无关联。

现实中有一种说法:从一个人的起点可以看到终点,一个从小穷怕的人,更容易对钱用心在意。无论是从事判断还是逻辑判断,“腐败出身论”都站不住脚。腐败与官小没关系,与什么出身也没有必然联系。有一些“农民的儿子”倒下过,但有更多“农民的儿子”在干事、没出事。从本意上讲,这些出事官员不是说出身寒门更易出问题,更可能是在提醒后来人,要珍惜来之不易的一切,要慎用权力,认识到“公款姓公,一分一厘不能乱花;公款为民,一丝一毫不能私用。”

真正的问题在于,不是这些出事官员不该念叨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,而是他们在想到这一点时,已经太迟了。他们在有权的时候,忘记了自己是“农民的儿子”,忘记了曾经的理想、曾经的追求、曾经的付出。如果他们早一天想到这句话,时时铭记这句话,把权力拿来为民办而不是为己谋私,何至于有出事这一天?何需在法庭上流泪忏悔?这才是最刻骨铭心的教训,最需闻者空心的警示。

权力是把双刃剑,有权可以办事,有权也可能出事。因此,官员别到出事时才想起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,而应将其当作“紧箍咒”,时时自问“我是谁、为了谁、依靠谁”。叹只叹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,胡长清们虽然醒了,只是想明白时已然迟了,空悲切而已。

「走班制」有利于因材施教

慕毅飞

日前,教育部发布《关于普通高级中学考试改革的实施意见》要求,2017年起,全国开始高考综合改革,在高考中实施语文、数学、外语3门学科全国统考,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6门学科任选3科的考试方法。不少教育专家认为,今后高中很可能将采用走班制进行教学,班主任可能消失(据12月20日新华社电)。

浙江省已在今年率先试点高考改革,省内部分高中2012年便在实际教学中实行了走班制。所谓走班制,主要是指分层次教学,即相关高考科目的教学,分为A和B两个或多个层次,其中A类班级适合学习程度更好的学生,B类班级则适合程度相对差一些的,依此类推。从试点的结果看,走班制学生的平均分要高于传统班级的平均分10分,说明走班制更有利于学生掌握相关知识。

笔者以为,走班制教学是必然趋势,获得良性成果也在情理之中。现在的高中多随班组合,同一个班级学生学习成绩必然参差不齐,就算进行了分班考试,按成绩分为“尖子班”“重点班”“普通班”……但语文好的学生数学未必好,物理好的学生化学未必好,总分相同的学生在分科上照样有前有后。教得深了,差的吃不了;教得浅了,好的吃不饱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除了走班制,真没有更好的选择。

分班教学,有它的优势,流水线作业,批量生产,用现代工业的方式办教育,提高了培养效率,但它不符合因材施教理念,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。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,为追求更好成绩,出现了“尖子班”“重点班”“普通班”。“尖子班”的硬件配置要比“普通班”强,有些学校连空调也只装在“尖子班”,进不了“尖子班”,学生就成了“二等公民”。这种分班行为,显然教育不公平,所以教育行政部门明令禁止。相比之下,走班制能有效规避歧视、体现公平。语文课进A班的,数学课可能进B班;数学课进A班的,历史课可能进C班。不存在歧视谁的问题,却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需要。

当然,实施走班制,要有前置条件,就是学生数要有明显的下降,从而保证教室和教师能满足需要。一旦走班,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学生分配不可能均衡,如果教室和教师数量不够,学生的层次划分就不可能更细,笼而统之,体现了走班制的优势,还会走入形式主义的窠臼。同时,还需要教育理念的革新,那就是不歧视差生,在教学资源配置上,不搞“优生优配”,而应坚持“合适的才是最好的”。

此前,教育部发布的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划》显示:近十多年来,中小学在校生人数逐年减少。笔者以为,在这种形势下,走班制的前置条件已经成熟,不仅高中可以有,初中、小学也可以有。如果所有学科走班,“优生优配”就失去了意义,从这个角度看,走班制不失为实现教育公平的一条有效途径。

职务何以成为腐败的“便利”

毛海清

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受贿案本月10日一审宣判:刘铁男获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判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媒体报道称,法院审理查明:刘铁男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为他人谋取利益,收受他人财物,构成受贿罪。

刘铁男如果不是担任发改委副主任、国家能源局局长职务,掌握资源审批大权,未必会有今天的结局。还有那个刘志军,如果不是身居铁道部长的职务,也不可能与权力摘客丁书苗结成“腐败同盟”。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,这些年来,大小官员的贪腐案例多有这个说法。对此,人们不禁要问,“职务”怎么会沦为贪腐犯罪的帮手呢?

笔者以为,职务之所以成为腐败行为的“便利”,问题在于两者之间介入了利益因素,却失去了制度约束和监督。权力与利益勾结是“腐败同盟”的基石,担任职务者若抵御不住利益的诱惑,就会背离职务准则,产生“权钱交易”“权色交易”等行为。如果对职务活动没有制度规范,缺乏监督机制,那么“职

务”成为腐败之“便利”就会由可能成为现实。一旦权力冲出制度的“笼子”,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,“公职”堕落成为腐败的帮凶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严格管理公职人员,加强对权力的监督,这本来是个常识,做起来并不简单。对干部的选拔、教育和管理不是有完整的规定吗?定项目、拨资金不是有严密的程序吗?工程招标不是有严谨的规范吗?办理案件不是有严格的规程吗?按理说,在这些规则面前,“职务”原本没有任何“便利”可言。但事实之所以相反,就在于其中一些规章制度形同虚设,中看不中用。

国家对公职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是政治生态的标志,政治生态的优劣关乎到千家万户的生存环境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,关键就是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反腐斗争中的主体作用。把人们崇拜权力、崇拜高官的心态转变为监督权力、监督官员的责任意识和实际行动。刘铁男的落马就是网民实名举报的结果。同样,只有依靠群众,才能让那些规章制度落地生根,变成真正的监督力量。唯有如此,官员的职务才不会那么容易成为腐败“便利”。



「头」入

高晓建 绘

还有多少“协会”在浑水摸鱼?

邓海建

自称是经过政府部门批准成立的行业协会,但在民政部网站上却查询不到相关记录,只用缴纳1.45万元的会员费,就能成为协会的副理事长。如今,遭到业内人士质疑的“中国营养协会”,又开始筹备2014年年会并公开招揽合作赞助商(12月20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。

对照我国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,不难发现,“中国营养协会”就是李鬼,与农民余思高创立的“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”没有什么区别。不好看看以下事实:个人会员加入协会成

为理事,一年的费用为890元,终身的理事会费需要4900元,最高缴纳9.45万元就能成为协会的副会长……待价而沽的“协会”,牌坊立得再高,也只是牌坊而已。

审计署此前公布的报告显示,我国多个行业协会以及社会组织存在问题。一些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和所属单位依托行政资源不当牟利,13个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,违规收入近30亿元。

一些“协会”成了“道场”,玩的就是权钱交易的把戏。在这种交易中,国家信用成了被变现的商品,以次充好、以假乱真,杜撰吓人的名号与评选,为交钱的企业送上虚假的桂冠,扰乱市场,诱导消费。最后,赚得盆满钵满的是忽悠者,受损的是诚信的市场机制和踏实经营的商家以及防不胜防的消费者。

这些道理,其实并不新鲜。这么多年,一些“协会”信奉“撑死胆大的,饿死胆小的”,说到底,无非是三个症结使然:一是主管部门权责不清,二是正牌协会行政化过重,三是不诉不究、处罚“点到为止”。要解决这些症结,惟有处理好政府、市场和社会组织三者的功能定位和关系。当务之急,千万别指望浑水摸鱼的“协会”能良心发现、自动退场,而是要拉网式清理,少些就事论事、多些举一反三,罚单重一点,拳头重一点。